



关于乾嘉学派的一些问题

——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综述

王俊义

为推动清史研究深入开展，促进《清史》的编写工作尽快提上日程，一九八二年九月，由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清史研究工作者近一百三十人出席了会议，其中既有研究清史的老一辈专家，也有近年来成长的后起之秀。他们向大会提供了七十篇论文，围绕康、雍、乾时期的清代社会，以及为人们所关心的大型《清史》的编纂规划，展开讨论。这次会议，既是对建国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检阅和总结，也是开创清史研究新局面的盛会。

清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；同时，因其距我们的时代很近，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联，研究和编写清代历史，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清代的康、雍、乾时期，史称“康乾盛世”。此时，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得以最后巩固确立，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统一，经济的发展繁荣，和封建学术文化的兴旺昌盛局面。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，是推进清史研究的关键环节。因此会议确定学术讨论的中心议题是：康、雍、乾时期的清代社会。会上，分组对这一时期的阶级、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、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、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、秘密宗教和秘密结社等问题，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。有对各自观点的正面阐述；也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交锋。充满了热烈、活跃的学术讨论气氛。这里仅就会上关于康、雍、乾时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的讨论，特别是有关乾嘉学派的一些问题，作些介绍和综述。

由于康、雍、乾时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，内容极为丰富，学者

辈出、著述如林，而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其它各时期的学术思想，具有不同的显著特点是，这时出现了乾嘉学派（或称乾嘉汉学、朴学、考据学），成为有清一代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。因而，对于康、雍、乾时期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的讨论，自然较为集中到乾嘉学派方面，讨论较为深入，涉及问题较多，诸如：①乾嘉学派产生盛行的条件和原因是什么？②乾嘉学派发展演变的过程如何？③乾嘉学派的成就、流弊和影响怎样？④对乾嘉学派的功过应作如何基本评价？⑤肯定乾嘉学派会不会导致忽视马列主义理论，只搞史料与考证的倾向？等等。概括起来，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。

一、关于乾嘉学派产生并得以盛行的原因

乾嘉学派，在乾隆、嘉庆时达到鼎盛阶段，但其前有肇端，后有延续，实际上贯穿了整个有清一代，为什么在清代产生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，并出现“家谈许郑，人说贾马，灿烂如日中天”的盛况呢？对此，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探讨，提出了新的看法，且有不同意见。

大家共同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，决不是孤立的、偶然的，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。但具体分析起来，看法则不尽一致。

长期以来，较为流行的传统看法是，由于清廷实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，屡兴文字狱，迫使一些学者为全身远祸，埋头故纸堆，走向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，似乎文字狱是乾嘉学派产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因。

有同志针对上述传统观点，提出不同意见。他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，乾嘉学派这种学术思潮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，其产生和兴盛的原因，应从社会经济条件中去寻找。恩格斯曾指出：“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，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。在这里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关，愈来愈混乱，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，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249页）意识形态受物质经济条件的支配制约，并有本身的递增演变规律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。而统治阶级的政策，只能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，却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其产生和消灭。把乾嘉学派的产生，归结为民族政策与文字狱，是片面的，也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。他们还指出，明代也存在文字狱，但明代并没有产生与乾嘉学派的研究范围和特点相类似的学术思潮。他们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，一方面从思想

本身的演变规律看，是对明末以来，束书不观，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的否定，这主要表现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重实证，重考据的经世之学，顾炎武实开启了乾嘉学派的先河；另一方面，自乾隆中叶以后，乾嘉学派发展到鼎盛阶段，则和康乾盛世密切关联，乾嘉学派实际是康乾盛世的产物。清初经过战乱，至康熙二十年之后，政治上逐步实现了稳定统一，社会经济得以恢复、发展和繁荣；与之相适应，康熙、乾隆作为杰出的封建帝王，也十分重视发展封建学术文化，他们都“稽古右文”，“崇儒重道”，注意吸收学习汉族的传统封建文化，荐山林隐逸，开博学鸿儒，大规模的搜书、编书和刻书，一时间书院林立，学者辈出，刻经读书之风甚盛，包罗宏富的《四库全书》，以及数百部校勘、辑佚、辨伪等方面的大部头著述，都是此时出现的。这种风气既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学者，也为更多的学者的涌现，创造了环境，提供了条件。如著名的乾嘉学者纪昀、邵晋涵、戴震、王念孙等，都参与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编修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如无康乾盛世，也就没有乾嘉学派。试想，如无康乾时期提供的雄厚的物质经济条件，能够编纂出《四库全书》等那种规模巨大的丛书、类书吗？

当然，清代封建统治者，为控制思想，泯灭民族意识，确屡兴文字狱，对学术思想的发展，包括乾嘉学派有一定影响，影响了学术思潮的内容和特点，但却不能视为乾嘉学派产生的主要原因，更不是唯一原因。

有的同志还提出，乾嘉学派的产生盛行，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，明清之际西方自然科学天文、物理、数学……等相继传入，致使清代的学者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锡阐、梅文鼎、江永、戴震等，都很重视自然科学，他们不仅有天文、历算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著述；而且其研究方法——形式逻辑的实证方法，论证问题条理、细密，也显然受有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。

总之，对乾嘉学派产生于文字狱之说提出质疑的同志，认为要考察乾嘉学派的产生，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注意到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，进行全面分析，不能只看到一点，而不顾及其余。

但有些与会同志，也针对上述意见，提出不同看法。他们认为经济基础固然决定社会意识，但二者之间关系的反映，毕竟是间接的、折射的。具体到乾嘉学派来说，其产生的直接原因，主要还在政治方面。

一则是清廷大兴文字狱；再则是由于统治者，对乾嘉汉学大力提倡。他们列举了清廷滥行文字狱的记载，并指出清代进步思想家龚自珍也曾揭露过：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。章太炎、鲁迅等对清代的文字狱，更有淋漓尽致地揭露。乾嘉学派的多数学者，之所以不触及社会实际问题，陷入烦琐的考据，正是清朝统治者推行封建专制主义，采取民族歧视政策，屡兴文字狱，实行思想控制的结果。另外，这些同志还认为，乾嘉学派之所以盛行，也和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有关。他们指出清朝统治者康熙、乾隆等，看起来也很推崇理学，但却常常对理学家，包括那些所谓理学名臣，极尽讽刺、挖苦之事，他们着力提倡的则是汉学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“乾隆皇帝崇理学，而并不提倡”。正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提倡，乾嘉学派才得以风行，并居学术思想的支配地位。

上述不同意见，在讨论过程中曾互相辩驳，展开交锋。持前种观点的同志进一步指出：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屡兴文字狱，虽是事实，但由于整个有清一代，满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成见，始终未能根本消除，过去，对清朝利用文字狱控制思想，造成的作用和影响难免有夸张的一面，特别是到辛亥革命时期，资产阶级思想家、宣传家，为反对和推翻清朝的统治，利用汉族群众的排满情绪，广为宣传满族的民族歧视、民族高压政策，于是，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盛行的观点，更为流行，其中包含有并不科学的成分。加之，解放后，因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考据学，对乾嘉学派也多从批判否定的角度进行考察，致使一些传统看法，流传至今。因而，探讨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时，应实事求是，具体分析，不要为传统看法所囿。

二、关于乾嘉学派的发展和演变

任何一种社会学术思潮的出现和流行，一般说来都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。一些同志指出，乾嘉学派也同样有其产生、发展、兴盛和没落的过程。在其不同发展阶段，表现形式和内容及其作用和影响，也各有不同。因而，在分析研究乾嘉学派时，必须注意到这一现象，以免笼统而论。

一些同志还具体论述了乾嘉学派产生、发展、兴盛、没落的过程，他们指出，顾炎武是乾嘉学派的开山和先驱，他关于考证、训诂、音韵

的研究，都为后来的乾嘉学派奠定了基础。然而，顾炎武的重视考证，是为了反对明末的空疏学风，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，并非是为考证而考证。显然，他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，却开一代风气，有积极作用。

稍后于顾炎武的胡渭、阎若璩，考据学风已大致定型。他们的《易图明辨》、《古文尚书疏证》等著作，都是用考证的方法，得出自己所要得出的结论。胡渭推翻了宋儒附会的河图、洛书等无稽之谈；阎若璩以确凿的论据，证明古文尚书系伪作。这些著作和观点的出现，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引起不小的震动。虽然，他们论证问题的方法，有烦琐的一面，所阐述的内容也充满了封建糟粕，但是，在理学盛行，河图、洛书说泛滥，古文尚书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形势下，胡、阎敢于对这些旧说持否定态度，并举出难以推翻的例证，使自己的结论，有很强的说服力。在学术史上有相当的积极意义。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寓于考证之中，以考证作为表达思想观点的方法和形式，很难说他们只有考据没有思想。与阎、胡大致同时的梅文鼎、顾祖禹、姚际恒、毛奇龄等，也分别在天文历算、历史地理、辨伪与考据等方面作出成绩和建树。

阎、胡之后，到乾隆时期的惠栋，公开打出“汉学”的旗帜，如同《汉学师承记》的作者江藩所说：“本朝为汉学者，始于元和惠氏。”这时，乾嘉学派正式形成“家谈许郑，人说贾马”的局面，就是此时出现的。惠栋片面强调考证、训诂，由字求义。而且，“唯汉是从”、“唯古是好”。他的门人弟子余肖客、王鸣盛、钱大昕、江声等，共同被称为乾嘉学派中的吴派，也都有这种倾向。惠栋等人开启了为考证而考证的学风，从消极方面对乾嘉学派的发展以重大影响。

与惠栋所代表的吴派并立的有戴震所代表的皖派。戴震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，而且是著名的考据学大师。他在名物、训诂、音韵、典制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在思想和考证两方面都有很大成就。他的“以理杀人，甚于以法杀人”的光辉思想，就是在《孟子字义疏证》这部训诂性的著作中提出的。虽然，他与惠栋的思想与治学方法有所不同，但却不能否认他是考据学家。既然戴震是考据学家，也进一步说明，并非所有乾嘉学派的学者都没有思想。同样，也不能因戴震有进步思想，便把他看作是反汉学的代表人物。戴震与惠栋并非两个根本对立的学派，不过是同属乾嘉学派中的各具特点所不同流派，即是同一流派的学者，也往往存在不同的歧异之点。沿着戴震的治学路径发展的，还

有些很有成就的学者，如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等。他们以考据的方法，整理古笈，在文字、训诂、校勘等方面卓有成绩，但其学术内容却缺乏社会实际问题，愈来愈走向为考证而考证。

由于乾嘉学派有为考证而考证的一面，流于烦琐和脱离实际，因而在乾嘉学派鼎盛之际，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该学派的弊病，章学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。到鸦片战争前，清代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转折，一方面清代的统治由盛转衰；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入侵，中国将沦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中国向何处去？社会提出一系列问题，需要从学术思想理论的角度加以阐明。乾嘉学派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，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，却不 对重大社会问题，作出思想理论上的阐述和概括。而且其末流，日益走向为考据而考据，甚至把考据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，当作卖弄风雅博学的装饰点缀，从而使这一学派走向没落。导致进步思想家如魏源、龚自珍等对之进行抨击；还有些封建卫道学者如方东树，也从右的方面对之进行攻击。此后虽仍不乏有一些严肃的学者，按乾嘉学派的治学途径发展，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潮，乾嘉学派则逐渐为新的经世致用思潮——今文经学所代替。这说明任何学术思潮要具有生命力，必须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和需要，否则必然走向没落。

在讨论会上，另外一些同志，不否认乾嘉学派有发展过程，也不否认顾炎武对乾嘉学派有一定影响。但却认为乾嘉学派主要是指乾嘉时期，以名物考据为特征的学术流派，不能把顾炎武看作乾嘉学派的开山和先驱。他们指出，清代学者江藩在《汉学师承记》中，就不把顾炎武列入正统，而摆在附录，说明正规的汉学家，并不认为顾炎武是乾嘉学派的先驱。这些同志还认为戴震虽有考证方面的著述，但他与一般的乾嘉学派学者有很大的不同，而是批判乾嘉汉学弊端的进步思想家。他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不能视为考据训诂著作，主要是披着注释儒家经典的外衣，阐发反理学思想的思想著述。但是，这些同志没有明确，戴震是否属于乾嘉学派营垒，是否属于乾嘉学派的一个流派。如果说，他不属于乾嘉学派，何以说明他是皖派学者的首领。如承认他是皖派首领，就难以否认他是乾嘉学派的一个流派，那就很难根据他与乾嘉学派的其他流派有所不同，便有意无意否认他是汉学家及其在考据方面的成就和影响，把他说成只是批判乾嘉汉学的进步思想家。

三、关于乾嘉学派的基本评价

对乾嘉学派的功过影响应作如何评价的问题。与会同志都认为乾嘉学派对古笈的整理有功绩。但肯定的程度、功与过的基本评价，却有很大程度的不同。

一些同志对乾嘉学派以较多的肯定，他们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的学术思潮，乾嘉学派作为在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，是封建社会末期有代表性的一种学术思潮。这种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思潮，并非中国所特有，西方国家的封建社会末期，也有重实证的洋考据，封建社会末期出现考据学派，一方面是对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总结，另一方面又注入未来社会的新鲜血液，有某些资本主义因素，对此不能忽视。既然，他的产生和出现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，就有它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，不能认为它是学术思想的畸形发展，中国近、现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章太炎、王国维、陈垣、陈寅恪、顾颉刚，乃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、范文澜都有很深的汉学功底，都受有乾嘉学派的影响，欲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，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笈，对乾嘉学派都应给以足够的重视。他们进而指出乾嘉学派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：

①与康乾盛世政治上的稳定统一、经济上的发展繁荣相一致，乾嘉学派是康乾盛世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。虽然，乾嘉学派的鼎盛阶段，在时间上稍晚于康乾盛世，这是因为学术上兴盛局面的出现，总要在政治经济的统一与发展之后。近年来对清代历史的研究，逐渐消除了某些偏见，对康乾时代政治上的统一、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形成，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，都给予一定的历史肯定，为什么对于与当时的政治、经济相适应的封建学术文化，却予以过多的否定呢？

②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典笈浩瀚的国家。历史上遗留下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。整理文化遗产，汲取其精华，剔除其糟粕，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方面。乾嘉学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曾对历史上的文化典笈进行过总结性的整理。许多内容颠倒、字句错乱的古笈，乾嘉学者予以考订正误，许多难以读懂的古笈，经过乾嘉学者的训诂考释，大致可以读通；又有许多散失的文献典笈经过乾嘉学者的辑佚、汇集，又保存流传至今。应该说，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是卓越的贡献。今天，我们要整理古笈，不可能不利用清儒成绩。正为郭沫若同志所指出

过的：“倘欲论古人或古事，不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。”同时，乾嘉学者通过整理古笈，形成的一套基本手段，如训诂、校勘、辑佚、辨伪等，对此也应予以批判继承。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整理古笈的专家。但必须有一批人从事古笈整理工作，要培养和训练一些新型的古笈整理工作者，否则大量的古笈整理工作，将后继无人。欲从事古笈整理工作，既要有马列主义理论指导，又必须具备乾嘉学派积累形成的基本功。

③乾嘉学派研究问题的方法，重视实证，注意博瞻贯通，每一事必“核其始末”。“究其异同”，占有大量材料，以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排比、归纳，而后得出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结论，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是比较科学的方法。另外，乾嘉学派中许多严肃的学者，踏实刻苦的钻研精神与学风，也有值得借鉴之处。

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认为，总的说来对乾嘉学派应该肯定多于否定，或者说应基本肯定。他们还认为乾嘉学派的末流为考据而考据，并非是乾嘉学者原来的出发点。

同上述观点相反，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，乾嘉学派虽然对古笈整理有一定成绩，但对之不应肯定过高。从总的方面看，该学派的消极和流弊方面更为突出。应看到乾嘉学派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，它窒息了明末清初富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思潮；也不同于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、魏源为代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。乾嘉学者的学术内容，缺乏思想性，不触及社会实际问题，引导人们脱离政治、脱离实际，钻古纸堆，搞烦琐考证，甚至解释几个古字往往动辄数万字，实在烦屑短钉。从清代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看，乾嘉学派对思想变革起了遏制和阻挠作用，它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奴仆。因而，对之进行总的评价时，应否定多于肯定，或基本否定。既不能肯定过多，更不能提倡回到乾嘉学派道路。

还有些同志认为对于乾嘉学派，既不能一概否定，也不应笼统肯定，对其基本评价可用八个字概括：成就巨大，流弊极深。只看其弊端，不看其成绩，全盘否定，不是对待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；但只看到其成就突出，不看其弊端，一味肯定，甚至提倡乾嘉学派道路，也是片面的。乾嘉学派的著述和成果，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，我们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，乾嘉学派有产生、发展、兴

盛和没落的过程，在对其进行评价时，应对该学派的不同发展阶段，分别给予不同的评价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不能笼统的说，乾嘉学者都没有思想，也不能说他们都脱离实际。但从乾嘉学派发展到没落阶段的情况看，他们的学术著作，确缺乏社会内容，有脱离实际、只搞烦琐考据的倾向，因而至鸦片战争前后，一些进步思想家，对乾嘉学派纷纷抨击，魏源就曾尖锐指出：“自乾隆中叶后，海内士大夫汉学”，只知“争治诂训音声，爪剖辄析”，“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”也“罔知漕、盐、河、兵得失何在”，造成的恶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。著名的乾嘉学派大师段玉裁晚年也曾追悔不已的说：“喜言训诂考核，寻其枝叶，略其本根，老大无成，追悔已晚”，对乾嘉学派的弊病深有感触。历史在发展，时代在前进，乾嘉学派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形势下，不能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内容，随着时代前进，其弊端也就更加暴露无遗。但是我们在对乾嘉学派进行总的评价时，不能只看到其末流。解放后，对乾嘉学派的评价，长期来有片面否定的倾向。我们应该清除片面性，对之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。

与会同志还认为，如何评价乾嘉学派，或肯定，或否定，或肯定中有否定，或否定中有肯定，是一个学术问题，完全可以展开百家争鸣。重视乾嘉学派，研究乾嘉学派，不过是把它作为历史遗产，给其一定的科学的历史地位，绝不是提倡复古，更不是颂古非今，也不是要提倡回到乾嘉学派道路。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乾嘉学者所处的时代，有本质不同，我们有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，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、方法论，乾嘉学派发展到末期，就已为新的社会思潮所批判、所代替。今天，我们怎么能再回到乾嘉学派的道路上去呢？

附：解放后有关乾嘉学派的论文目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 | 王瑶 | 《光明日报》 | 1956.11.16 |
| 论清代汉学家学术思想 | 吴则虞 | 《安徽历史学报》 | 1958年第2期 |
| 看看胡适的“历史态度”和“科学方法” | 范文澜 | 原载《历史研究》 | |
| | | 1955年第3期，后收入《胡适思想批判论文选集》三联 | 1959年版 |
| 阎若璩 | 张一彭 | 《山西地方史研究》第一辑 | 1960年山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|
| 乾嘉史学初探 | 祁龙威 | 《江海学刊》 | 1962年第1期 |
| 陈宏谋与考据 | 刘乃和 | 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 | 1962年第2期 |

- 关于乾嘉学者王念孙 . 祁龙威 《学术月刊》 1962年第7期
- 从古文字方面评价清代文字、声韵、训诂之学的得失 于省吾《历史研究》 1962年第6期
- 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(综述) 尤置 《学术月刊》 1964年第4期
- 谈“乾嘉学派” 杨向奎 《新建设》 1964年第7期
- 论章学诚对乾 考据学的批判 刘益安 《学术月刊》 1964年第5期
- 论乾嘉学风 罗思鼎 《文汇报》 1964年5月19日
- 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 罗思鼎 《学术月刊》 1964年第5期
- 评乾嘉考据学的方法论 罗思鼎 《解放日报》 1964年6月7日
- 论乾嘉考据学的历史作用及其批判继承问题 刘益安 《学术月刊》 1965年1期
- 戴震与古笈整理 —— 并谈对清代考据学派历史经验的批判继承
孙钦善 《北京大学学报》 1980年第1期
- 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简论 朱端强 《历史教学》 1981年第6期
- 汉学探析 戴逸 载《清史研究集》第二集 1982年6月
- 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评价 任 清《人民日报》 1982年10月25日

